

中国文化贸易出口的高质量发展研究： 基于语言情景视角

张玲

(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 北京 100144)

摘要:文化贸易出口是国家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体现,而语言在文化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使用2010—2022年国际数据,实证检验了语言距离、语言能力与文化贸易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语言距离阻碍了文化贸易出口,但语言能力有效缓解了语言距离对文化贸易的阻碍作用。同时,语言能力在市场开放度高的国家、与我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和出口复杂度高的国家,更能有效地缓解语言距离对文化贸易的阻碍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语言能力更能缓解语言距离对核心文化贸易的阻碍作用,而数字技术弱化了语言能力对语言距离的缓解作用,但在数字技术较低的国家中缓解作用更显著。为此,应积极、精准缓解不同情景下语言因素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提高文化贸易竞争力。

关键词:文化贸易;语言距离;语言能力;核心文化贸易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566(2024)04-0037-09

Research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al trade export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scenarios

ZHANG l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144, China)

Abstract: The export of cultural trade is an important embodiment of a country's soft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and languag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ultural trade. Using international data from 2010–2022,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distance, language ability and cultural trade. The results show that language distance impedes the export of cultural products, but language ability effectively alleviates the impeding effect of language distance. At the same time, language ability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obstructing effect of language distance on cultural trade in the context of higher market openness, free trade agreement signing with China and high export complexity. Further research finds that language ability can better mitigate the obstructive effect of language distance on core cultural trade, while the use of digital technology weakens the mitigating effect of language ability on language distance, but the mitigating effect is more significant in countries with low digital technology. Therefore, we should actively and accurately mitigat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language factors in different scenarios, and further improv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cultural trade.

Key words: cultural trade; language distance; language ability; core culture trade

收稿日期:2023-10-09 修回日期:2024-03-01

基金项目: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重点课题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外语教育研究:基于文化贸易及文化传播视角”(23WYJ0302)。

作者简介:张玲(1980—),女,湖北恩施人,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语言经济、国际文化与贸易。

文化贸易作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分支,逐渐成为很多国家的支柱产业或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也被视为实现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途径。长期以来,我国对外文化贸易出口总体呈现良好发展态势,2010 年就超过美国跃升为世界第一大文化出口大国。但同时也应看到,我国是一个文化贸易大国但还不是文化强国,也面临严峻复杂形势和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又再次作出部署,强调“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①。

文化贸易本质上是一种互动行为,必须建立在有效互动的基础之上,离不开语言这一基本沟通工具。毋庸讳言,我国汉语特征与很多国家语言在词汇、语法、语音以及拼写规则上存在较大差异,这种语言距离可能影响文化交往和贸易。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我国孔子学院在欧美国家受到了一定负面冲击,还面临西方国家的语言霸权、文化帝国主义等影响。为此,2022 年商务部等 27 部门发布的《关于推动对外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指出,“提升国家语言服务能力,用好小语种人才资源,为文化产品、服务、标准走出去提供专业支撑”^②。

语言在文化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何有效发挥语言因素对文化贸易的作用值得深入研究。通常,语言特征相对固化,语言距离是客观存在且相对稳定的因素,那么如何在文化贸易中更好缓释语言距离可能存在的负面效应?显然,语言能力是基于主观视角出发的积极行为,可针对语言距离进行能动性调节,或对外部环境变化进行优化,继而形成适应性调整。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和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形势下,有必要从语言能力这一主观行为入手探讨不同情景下的作用机理和路径,更好推动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

一、文献回顾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具有经济、政治、社会等属性,突出表现在语言是一种人力资本^[1]。在经贸往来中,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去学习该国语言、了解该国文化,尤其是语言与信任、文化等有较强关

联,影响经济发展^[2-3]。多数研究表明,语言资源能够带来巨大红利,对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有影响,促进经济增长、带动语言产业发展,成为国家综合实力重要组成部分^[4-5]。

世界上有 7 000 余种语言,在词汇、语法、语音以及拼写规则上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导致双方对彼此语言具有陌生感,排斥与语言距离较大的国家进行贸易往来^[6]。对于语言距离的描述与刻画主要有构造虚拟变量^[7]、利用语言树的分支计算语言距离^[8]、构造英语便利度^[9]、WALS 指数法^[10-11]等类。多数研究表明,语言距离会阻碍双边贸易,尤其是给产品出口带来负向作用^[9-11],但也有少部分持相反观点^[12]。

我国对外文化贸易发展迅猛,但也存在一些结构性挑战。尤其是,工业制造模式下缺乏价值输出为核心的文化出口,存在全球文化产业价值链低端锁定风险等结构性、竞争力问题^[13-14]。实际上,我国应阐释和传播自信的文化^[15],且文化自信对文化产品出口发挥显著促进作用^[16]。此外,部分研究探索了综合型语言考试与语言能力标准的对接方法^[17]。同时,多数研究认为学习通用语言能够显著地促进双边贸易,或者针对性制订语言规划政策可以促进特定国家的贸易^[9,18]。

总体来看,已有文献较少采用理论或实证方法考察语言对文化贸易的影响,更缺乏深入挖掘缓解语言距离所带来负面影响的机理研究。鉴于此,本文使用国际年度数据,构建我国汉语与其他国家的语言距离指数,从语言能力维度探究其是否能够缓解语言距离对文化贸易的影响效应,并分析不同情境下的作用效果。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语言距离与文化贸易

国际贸易是一种互动经济行为,受文化场域、审美取向、文化背景和历史传统等因素影响,语言差异大的两国间容易发生“文化折扣”。语言会通过影响认知、个人偏好,对国际文化贸易产生影响。首先,语言距离越大意味着文化歧义、翻译差

① 具体内容见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② 具体内容见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7/30/content_5703621.htm?eqid=d37850920000877c0000006648e615b。

错等发生概率越大,导致语言摩擦和沟通错误就会越多,从而不利于贸易达成。换言之,语言差异越大,沟通时“噪声”越大,信息传递失真的可能性越大,从而形成较大交易成本,影响双方贸易交往。其次,从文化贸易需求看,通常消费者是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风俗习惯及行为偏好等进行决策。但是,语言距离使得文化产品进口国消费者存在信息搜索、意识形态等障碍,一般会降低产品的接受度及购买意愿。反之,语言距离小的两国消费者存在偏好相似性,还能产生文化消费的“理性成瘾”,从而进一步促进文化产品消费扩大。故而,基于交易成本、消费者偏好等视角,提出研究假设 H1:语言距离与文化贸易存在负向相关关系,即语言距离的存在不利于我国对外文化贸易出口的发展。

(二) 语言能力对语言距离与文化贸易的影响

双边贸易中存在语言距离是客观且普遍存在的,而语言距离又通常被认为会阻碍国际贸易发展。那么,如何才能有效降低语言距离的阻碍作用呢?值得注意的是,语言能力同样是一种人力资本,可以对其进行投资,通过语言学习、使用,可以获得相关效用和收益。其中,国际语言文化推广机构是语言能力重要路径之一^[5]。语言能力可从主观维度进行调节,人们可以通过学习其他国家语言达到有效沟通、降低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性目的。一方面,双边贸易中的语言能力提升,能有效对冲语言距离产生的交易成本。一旦具有较强语言能力,意味着能快速掌握贸易伙伴国的语言,形成良好的语言表达与沟通能力,直接降低了信息不对称,消除了交易过程中的误解、信息失真,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高效达成交易。另一方面,学习一门语言的过程,实际也是对贸易对象国的文化、风俗习惯的了解过程,有助于增进文化认同、信任程度。良好的语言能力可以更有效地理解文化产品背后的价值和内容,增进彼此贸易产品的需求共性、激发潜在的消费需求,进而提升双边文化贸易。简言之,语言能力可以从交易成本与贸易需求两方面,降低语言距离带来的贸易阻碍作用。因此,提出研究假设 H2:语言能力能有效缓解语言距离对文化贸易的阻碍作用。

(三) 不同情境下语言能力的缓解作用

对市场开放度更高的国家来说,国际贸易、人

文交流更加活跃,对语言沟通的需求、频度更大。同时,这些国家为语言学习、掌握他国语言能力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场景,以及学习语言更便利的环境。另一方面,市场开放程度更高,也表明该国对“舶来品”或外来事物排斥性越弱,对其他国家的语言、文化产品进口的接受度更大。总体来看,市场开放程度越高的国家,其市场的效率越高、营商环境越好,能够吸引更多的国际文化贸易。因此,提出研究假设 H3:在市场开放度更高的国家,语言能力更能缓解语言距离对文化贸易的阻碍作用。

国际文化贸易受到经济、政治、法律、地缘等因素影响,这些因素既有本国原因,也有贸易伙伴或国际政治等方面原因,具有较大不确定性。但贸易双方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不失为一个解决贸易争端、促进贸易规模和效率的有效方法。一方面,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从国家层面注入了确定性,降低了贸易双方信息的不对称,便于保障贸易双方的权益,从而让贸易双方更加专注贸易协定内容的履行。另一方面,签订贸易协定具有信号作用,有助于引导双边人文交流和经贸往来。同时,提升语言能力需要相当一段时间,而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无疑是给未来注入了确定性,有助于激发各方提升语言能力的兴趣。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 H4:相比没有与我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而言,面向与我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来提升语言能力,更能缓解语言距离对文化贸易的负面影响。

从国际贸易的产品结构来看,出口产品所含技术含量也是影响其他国家需求的重要因素。通常,原材料、生活用品等一般性国际商品或货物贸易涉及的产品技术含量较低。对其他国家的消费者来说,在通识中已获得了解,即便不了解出口国的语言、文化,一般也不会影响双方贸易。相反,如涉及进口产品所含技术较高,则更需要专业语言、技术知识作为支撑,也就更需要专业语言能力或学习迁移能力,而通过学习他国语言则有助于更好达成交易。对比而言,语言能力更能缓解出口复杂度较高国家的语言距离障碍。因此,提出研究假设 H5:相比出口复杂度较低的国家,语言能力更能缓解出口复杂度较高国家中语言距离对文化贸易的负面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考虑到文化贸易中与我国密切相关国家的影响,采用 66 个国家作为研究样本,使用 2010—2022 年面板数据,在剔除了数据缺失的观测值后,最终得到 739 个观测值。

数据来源及处理说明如下:①*Culture_Trade*(我国对其他国家的年度文化贸易出口数量),数据来源于 CEPII BACI 国际贸易数据库;②*Language_Distance*(汉语与其他国家语言的距离),基础语言特征数据来源于 WALS 网站;③*Language_Ability*(语言能力),数据来源于英孚英语教育发布的《英孚英语熟练度指标报告》;④*GDP*(人均 GDP),来自 Bvd 数据库;⑤*FTA*(自由贸易协定),数据来源于商务部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⑥*Trade_Freedom*(市场开放度),数据来源于美国传统基金会(HF)《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⑦*Total_Trade*(贸易总额),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网站;⑧*Common_Religion*(共同宗教)、*Geographic_Distance*(地理距离),来源于 CEPII 数据库;⑨*Political_Distance*(政治制度距离),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WGI 数据库;⑩共同语言(*Common_Language*),来源于 CIA 以及维基百科。

(二) 实证模型

为检验语言距离对文化贸易的影响,参考已有文献^[2,10],构建如下模型:

$$Culture_Trade = \beta_0 + \beta_1 Language_Distance + \beta_2 Total_Trade + \beta_3 GDP + \beta_4 Common_Religion + \beta_5 Geographic_Distance + \beta_6 Common_Language + \beta_7 Trade_Freedom + \varepsilon \quad (1)$$

在模型(1)中文化贸易(*Culture_Trade*)为被解释变量,语言距离(*Language_Distance*)为解释变量,该值越大表示两国之间的语言距离越大。为了保持结果可靠性,模型(1)中还增加了控制变量贸易总额(*Total_Trade*)、贸易国人均 GDP(*GDP*)、共同宗教(*Common_Religion*)、地理距离(*Geographic_Distance*)、共同语言(*Common_Language*)和贸易自由度(*Trade_Freedom*)。在模型(1)中,关注重点是语言距离(*Language_Distance*)回归系数 β_1 的显著性。当这个回归系数显著为负时,说明语言距离与对外文化贸易负相关,即语言距离会阻碍文化

贸易。此外, $\beta_0 \sim \beta_7$ 为各变量的回归系数, ε 为残差项。

为检验语言能力是否缓解语言距离对文化贸易的阻碍作用,构建的实证检验模型为:

$$Culture_Trad = \beta_0 + \beta_1 Language_Distance + \beta_2 Language_Ability + \beta_3 Language_Distance \times Language_Ability + \beta_4 Total_Trad + \beta_5 GDP + \beta_6 Common_Religion + \beta_7 Geographic_Distance + \beta_8 Common_Language + \beta_9 Trade_Freedom + \varepsilon \quad (2)$$

在模型(2)中文化贸易(*Culture_Trade*)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为语言距离(*Language_Distance*)、语言能力(*Language_Ability*)以及两者的交互项(*Language_Distance* × *Language_Ability*),控制变量与模型(1)保持一致。在模型(2)中,关注重点的是交互项(*Language_Distance* × *Language_Ability*)回归系数 β_3 的显著性,当该回归系数显著为正时,说明语言能力能够缓解语言距离对文化贸易的抑制作用。

(三) 变量选取

①文化贸易。利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09 年文化统计框架中界定的文化产品来衡量一国文化产品出口状况^[14]。具体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 UNCTAD,以 HS2007 编码为基础,选取了文化和自然遗产、表演和庆祝活动、视觉艺术和手工艺、书籍和报刊、音像和交互媒体、设计和创意服务 6 大类,13 小类,共 85 种商品,作为本文研究的文化贸易产品。

②语言距离。参考已有文献 WALS 指数法,对语言距离进行测度^[10-11]。具体统计方法和步骤如下:首先,根据 CIA World Factbook 各国语言使用人口统计,确定使用人口比例最多的语言为该国代表语言,如没有该数据则使用一国官方语言为代表语言;其次,汉语普通话在 WALS 中的语言特征数量共 153 个,将各国语言与汉语特征逐一进行比较,相同则取 0,否则取 1;最后,对各语言得分进行加权汇总,就是其他语言与我国汉语的语言距离。

③语言能力。借鉴文献[9]研究,使用各国托福平均成绩来度量各国国民语言能力,成绩数据来源于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TS)每年发布的“TOEFL Test and Score Data Summary”,并将所有

英语国家的托福考试成绩统一设定为 108 分(占满分 120 分的 90%),模型对英语国家和非英语国家类型进行控制。

④市场开放度。选取美国传统基金会(HF)贸易自由度指数,作衡量样本国市场开放度的变量。

⑤自由贸易协定。如一国和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则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数据来源于商务部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进行手工整理。

⑥出口复杂度。本文对于出口复杂度的定义为:

$$Exteci = \sum_j \left\{ \frac{x_{ji}}{X_j} Y_j \right\} \quad (3)$$

式(3)中, $Exteci$ 指产品*i*出口的技术复杂度。 x_{ji} 表示*j*国或地区的产品*i*出口额, X_j 是*j*国或地区的出口总额。 Y_j 代表*j*国或地区的人均收入。用式(3)计算某一商品出口技术复杂度后,再用公式(4)计算各国的出口复杂度。

$$Extec_j = \sum_i \left\{ \frac{x_i}{X} Exteci \right\} \quad (4)$$

式(4)中, $Extec_j$ 为一国或地区*j*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x_i 为一国或地区商品*i*的出口额; X 为该国或地区出口总额; $Exteci$ 为商品*i*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⑦控制变量。参考已有文献[9]控制了以下因素:贸易总额(*Total_Trade*)、人均 GDP(*GDP*)、共同宗教(*Common_Religion*)、政治制度距离(*Political_Distance*)、地理距离(*Geographic_Distance*)、共同语言(*Common_Language*) (见表 1)。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从表 2 可知,文化贸易出口(*Culture_Trade*)取自然对数后的最小值为 11.478,最大值则为 23.318,说明样本期间内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文化贸易存在较大差异。同样,核心文化贸易(*Core_Culture_Trade*)取自然对数后的最小值与最大值,分别为 5.643 和 21.536,标准差为 2.282,说明核心文化贸易也存在较大的国别差异。语言距离(*Language_Distance*)的均值为 0.742,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 0.392 与 0.974,表明我国与其他国家

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文化贸易	<i>Culture_Trade</i>	根据《2009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统计框架》,选取 HS07 编码中 85 种商品作为文化贸易的产品统计出口额
语言距离	<i>Language_Distance</i>	通过 WALS 指数法进行测度
语言能力	<i>Language_Ability</i>	样本国当年参加托福考试的成绩平均分
市场开放度	<i>Trade_Freedom</i>	根据美国传统基金会公布的贸易自由度指数
自由贸易协定	<i>FTA</i>	一国和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则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出口复杂度	<i>Exports_Sophistication</i>	根据 Hausmann 等(2007)模型
贸易总额	<i>Total_Trade</i>	商品和服务的进口和出口总额/国内生产总值
人均 GDP	<i>GDP</i>	国内生产总值/总人口
共同宗教	<i>Common_Religion</i>	如果信仰佛教人数占比最多则赋值为 1,否则为 0
政治制度距离	<i>Political_Distance</i>	采用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 WGI 的六个维度来测算中国与文化产品出口对象国的政治距离
地理距离	<i>Geographic_Distance</i>	根据 CEPI 数据库,利用大圆公式北京与其他国家首都之间的距离
共同语言	<i>Common_Language</i>	官方语言含中文的样本国的共同语言变量赋值为 1,否则为 0

之间的语言距离存在很大差异。语言能力(*Language_Ability*)的最小值为 38,最大值为 90,表明样本内不同国家之间的语言能力差异性较为明显。

市场开放度(*Trade_Freedom*)的均值为 0.772,但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 0 和 0.962,说明样本内国家的总体市场开放度较高,但存在较大差异性。自由贸易协定(*FTA*)的均值为 0.184,说明目前样本内国家与我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还比较少。出口复杂度(*Exports_Sophistication*)的均值为 1.482,方差为 0.465,同样说明不同国家的出口复杂度差异性明显。上述结果说明,样本内国家的市场开放度、自由贸易协定和出口复杂度均存在明显差异,极可能使语言能力、语言距离与文化贸易关系呈现异质性。

本文从 3 方面考虑了共线性问题:①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基本都小于 0.5;②进行方差膨胀因子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的 VIF 都远远小于 10;③在主回归分析时,均是先对核心变量进行回归,然后再加入控制变量进行

回归,两者的回归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未发生改变、大小变化不大。总体看,本文不存在明显的共线性问题。

表 2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MIN	P25	P50	P75	MAX
Culture_Trade	17.246	2.302	11.478	15.535	17.136	19.028	23.318
Core_Culture_Trade	14.468	2.282	5.643	12.968	14.378	15.679	21.536
Language_Distance	0.742	0.176	0.392	0.588	0.794	0.922	0.974
Language_Ability	52.82	9.789	37.811	46.617	51.317	58.413	90.011
Trade_Freedom	0.772	0.124	0	0.712	0.802	0.871	0.962
FTA	0.184	0.389	0	0	0	0	1
Exports_Sophistication	1.482	0.465	0.452	1.132	1.487	1.824	2.738
Total_Trade	0.938	0.576	0.002	0.547	0.859	1.214	4.382
GDP	1.433	1.647	0.038	0.284	0.748	1.965	8.572
Common_Religion	0.156	0.363	0	0	0	0	1
Political_Distance	2.483	1.094	0.687	1.718	2.179	3.238	5.497
Geographic_Distance	8.617	0.496	6.862	8.358	8.754	8.904	9.815
Common_Language	0.016	0.124	0	0	0	0	1

(二)语言距离对文化贸易的影响分析

使用实证模型(1)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

列(1)未对任何变量进行控制,列(2)则控制了贸易总额(*Total_Trade*)、贸易国人均 GDP(*GDP*)、共同宗教(*Common_Religion*)、地理距离(*Geographic_Distance*)、共同语言(*Common_Language*)和贸易自由度(*Trade_Freedom*)。

表 3 语言距离对文化贸易的影响

序号	(1)	(2)
变量	文化贸易 <i>Culture_Trade</i>	文化贸易 <i>Culture_Trade</i>
Constant	21.861 2 *** (27.96)	16.356 7 *** (16.25)
<i>Language_Distance</i>	-3.726 8 *** (-9.16)	-2.756 2 *** (-5.96)
<i>Total_Trade</i>	—	0.246 4 *** (7.56)
<i>GDP</i>	—	-0.462 5 (-1.21)
<i>Common_Religion</i>	—	0.009 9 (0.52)
<i>Geographic_Distance</i>	—	0.872 2 *** (3.42)
<i>Common_Language</i>	—	0.752 5 (1.15)
<i>Trade_Freedom</i>	—	-1.951 2 *** (-3.81)
N	739	739
Adj. R ²	0.467	0.579

注:***表示在 $p < 0.01$ 时有统计学意义,括号内为 t 值。

列(1)中语言距离 *Language_Distance* 的回归系数为 -3.726 8,并在 1% 水平显著。同样,在列(2)中语言距离 *Language_Distance* 的回归系数在 1% 水平显著为 -2.756 2。上述结果表明,语言距离显著降低了我国向其他国家的文化贸易出口额度。当两国语言距离较大时,为准确了解对方所要表达的内容、意图,相对方需要投入更大人力、

物力去规避潜在的风险,这无形中会增加贸易成本,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文化贸易额。

(三)语言能力对语言距离与文化贸易的影响分析

表 4 列示了语言能力、语言距离与文化贸易的影响的实证结果。在列(1)中未对任何变量进行控制,而列(2)则控制了贸易总额(*Total_Trade*)、贸易国人均 GDP(*GDP*)、共同宗教(*Common_Religion*)、政治制度距离(*Political_Distance*)、地理距离(*Geographic_Distance*)、共同语言(*Common_Language*)。

表 4 语言距离、语言能力与对外文化贸易

序号	(1)	(2)
变量	文化贸易 <i>Culture_Trade</i>	文化贸易 <i>Culture_Trade</i>
Constant	11.803 9 *** (33.07)	7.668 2 *** (14.61)
<i>Language_Distance</i>	-5.319 4 *** (-13.52)	-3.891 8 *** (-10.62)
<i>Language_Ability</i>	-0.032 8 (-0.86)	-0.052 7 (-1.48)
<i>Language_Distance</i> × <i>Language_Ability</i>	0.211 9 *** (3.78)	0.311 2 *** (4.54)
<i>Total_Trade</i>	—	-0.572 7 *** (-3.81)
<i>GDP</i>	—	0.408 3 *** (7.56)
<i>Common_Religion</i>	—	1.108 5 *** (5.28)
<i>Political_Distance</i>	—	-0.068 5 (-0.81)
<i>Geographic_Distance</i>	—	1.357 7 *** (6.05)
<i>Common_Language</i>	—	1.364 8 ** (2.05)
N	739	739
adj. R ²	0.318	0.482

列(1)中 *Language_Distance* 语言距离的回归系数为 -5.319 4,并在 1% 水平显著,同样列(2)中 *Language_Distance* 语言距离回归系数在 1% 水平显著为 -3.891 8,再次说明语言距离减少了文化贸易。根据实证模型(2),焦点是语言距离和语言能力的交互项(*Language_Distance* × *Language_Ability*),在列(1)和列(2)中分别为 0.211 9 和 0.311 2,且均在 1% 水平显著,表明语言能力缓解了语言距离对文化贸易的阻碍作用。可能的原因是,一国的语言能力越强,代表该国人民越能快速掌握其他国家的语言,可以弥补两国语言天然存在的语言距离。此外,受消费偏好影响就越小,进

而缓解了语言距离对文化贸易的阻碍作用。

(四) 不同情境分析

1. 基于市场开放度的情境分析

根据美国传统基金会的贸易自由度指数,将样本国家划分为市场开放度高和市场开放度低的两组国家,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列(1)中 $Language_Distance \times Language_Ability$ 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显著为0.2714,在列(2)中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0.4258。对比两列交互项系数大小说明,语言能力在市场开放度高的国家,更能缓解语言距离对文化贸易的阻碍作用。原因可能是,市场开放度高,则意味着该国或地区市场化、法治化程度高,营商环境更好,有助于语言能力更好地发挥作用,更有效地缓解了语言距离的负面影响。

表5 情境分析:市场开放度

变量	(1)	(2)
	<i>Culture_Trade</i> 市场开放度低的国家	<i>Culture_Trade</i> 市场开放度高的国家
<i>Language_Distance</i>	-2.3515*** (-5.28)	-5.4115*** (-7.12)
<i>Language_Ability</i>	-0.0428 (-0.84)	-0.1386** (-1.97)
$Language_Distance \times Language_Ability$	0.2714*** (4.15)	0.4258*** (4.8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i>N</i>	450	289
adj. R^2	0.528	0.495

2. 基于自由贸易协定的情境分析

将样本国家划分为与我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国家和没有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两组,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列(1)中 $Language_Distance \times Language_Ability$ 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显著为0.7102,在列(2)中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0.4539,列(1)中交互项系数比列(2)更大,说明对于和我国签订自由贸

表6 情境分析:是否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变量	(1)	(2)
	<i>Culture_Trade</i> 签订组	<i>Culture_Trade</i> 未签订组
<i>Language_Distance</i>	-14.7865*** (-12.72)	-0.5054 (-1.02)
<i>Language_Ability</i>	-0.3785*** (-6.02)	-0.0201 (-0.32)
$Language_Distance \times Language_Ability$	0.7102*** (8.12)	0.4539*** (4.0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i>N</i>	148	591
adj. R^2	0.766	0.559

易协定国家样本组,语言能力更能缓解语言距离对文化贸易的阻碍作用。原因可能是,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能更好地降低不确定性或风险,语言能力能更好地发挥其降低语言距离、促进文化贸易的作用。

3. 基于出口复杂度的情境分析

将样本国家划分为出口复杂度高和出口复杂度低的两组国家进行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列(1)中 $Language_Distance \times Language_Ability$ 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显著为1.2128,而在列(2)中交互项的系数并不显著,说明只有在出口复杂度高的样本组中,语言能力才能缓解语言距离对文化贸易的阻碍作用。原因可能是,如果出口复杂度低,则意味着该国或地区文化产品需求的技术及其附属的语言特性较差,导致语言能力无法更好地发挥作用;反之,则效果更显著。

表7 情境分析:出口复杂度

变量	(1)	(2)
	<i>Culture_Trade</i> 出口复杂度高的国家	<i>Culture_Trade</i> 出口复杂度低的国家
<i>Language_Distance</i>	-2.1475*** (-3.95)	-1.2075 (-1.32)
<i>Language_Ability</i>	-0.4517*** (-8.14)	0.4025*** (3.48)
$Language_Distance \times Language_Ability$	1.2128*** (9.02)	-0.3226 (-1.4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i>N</i>	426	313
adj. R^2	0.642	0.389

(五) 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上述结果和结论的可靠性,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

1. 更换计量模型。为避免存在互为因果关系,确保结论的可靠性,使用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控制了年份时间固定效应和地区固定效应,回归结果说明所得结论是可靠的。

2. 删除非“一带一路”研究样本。删除样本国家包括美国、日本、韩国、德国、澳大利亚、巴西等,重新使用实证模型(1)和(2)进行回归,结果说明所得结论是可信的。

五、进一步分析

(一) 区分核心文化与非核心文化贸易

表8列示了语言距离、语言能力与核心文化、非核心贸易之间的关系检验结果。列(1)以核心文化贸易(*Core_Culture_Trade*)作为被解释变量,列

(2)非核心文化贸易(*NonCore_Culture_Trade*)作为被解释变量。

表 8 区分核心和非核心文化贸易

变量	(1)	(2)
	核心文化 <i>Core_Culture_Trade</i>	非核心文化 <i>NonCore_Culture_Trade</i>
<i>Constant</i>	1.651 8 (0.87)	16.734 6*** (3.82)
<i>Language_Distance</i>	-3.624 5*** (-8.97)	-11.775 8*** (-3.23)
<i>Language_Ability</i>	-0.032 9 (-0.88)	-0.054 7 (-1.18)
<i>Language_Distance</i> × <i>Language_Ability</i>	0.310 4*** (5.15)	0.172 5* (1.9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i>N</i>	739	739
adj. <i>R</i> ²	0.617	0.562

列(1)中 *Language_Distance* 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3.624 5,且在 1% 水平显著,同样说明语言距离减少了核心文化贸易。关注的焦点交互项 *Language_Distance* × *Language_Ability* 在 1% 水平显著为 0.310 4,说明语言能力可以缓解语言距离对核心文化贸易的负向影响。同样,在列(2)中 *Language_Distance* × *Language_Ability* 的回归系数为 0.172 5 并在 10% 水平显著,说明语言能力也缓解了语言距离对非核心文化贸易的负向影响。但核心文化贸易的交互项回归系数更大,说明语言能力更能缓解语言距离对核心文化贸易的负向影响。原因可能是,核心文化产品的语言、文化属性更强,语言能力可以更针对性发挥正面影响效果来缓释语言距离的负面影响。

(二)数字技术对文化贸易的影响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正悄然改变着语言传播、学习,甚至也影响着文化经贸合作^[19]。使用世界银行统计的各国固定宽带订阅数作为该国数字技术平衡量指标,并根据中位数分为高数字技术国家组和低数字技术国家组,结果如表 9 所示。列(1)和列(2)中 *Language_Ability* 均显著,同时列(1)中的系数更大,说明在数字技术发达的国家中语言能力对文化贸易的促进效果更明显,从侧面表明数字技术有利于提升语言学习能力。列(1)中交互项 *Language_Distance* × *Language_Ability* 为 0.195 7 但不显著,但在列(2)中回归系数在 1% 水平显著为 0.175 8,说明在数字技术较低的国家中语言能力才能缓解语言距离对文化贸易的负向影响。数字技术的普及与应用使得通过语言了

解他国文化的重要性下降,在高数字技术国家中语言能力对语言距离的缓解作用降低。

表 9 区分高数字技术国家与低数字技术国家

变量	(1)	(2)
	高数字技术国家 <i>High_Data</i>	低数字技术国家 <i>Low_Data</i>
<i>Constant</i>	20.112 9** (2.12)	14.102 7** (2.29)
<i>Language_Distance</i>	-4.162 3 (-1.28)	-8.246 1*** (-6.14)
<i>Language_Ability</i>	2.004 4*** (4.72)	0.814 8*** (4.63)
<i>Language_Distance</i> × <i>Language_Ability</i>	0.195 7 (1.46)	0.175 8*** (7.7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i>N</i>	258	481
adj. <i>R</i> ²	0.751	0.545

进一步而言,人工智能、神经网络、机器翻译等技术不断推陈出新,在语言各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正悄然改变着语言学习和教学,一定程度上能降低语言距离的负面作用,对文化贸易的积极作用应引起高度重视。

六、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 (1)语言距离阻碍了对外文化贸易出口。
- (2)语言能力有效缓解了语言距离对文化贸易的阻碍作用。
- (3)情境分析表明,语言能力在市场开放度高的国家、与我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出口复杂度高的国家中,更能有效缓解语言距离对文化贸易的阻碍作用。

(4)进一步还发现,语言能力更能缓解语言距离对核心文化贸易的阻碍作用,而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弱化了语言能力对语言距离的缓解作用,但在数字技术较低的国家中缓解作用更显著。

(二)建议

一是,重视语言距离对我国文化产品出口的客观影响基础上,针对性选择目标市场开展文化贸易出口。在同等语言距离或差异水平上,优先选择文化底蕴水平高、国家政治稳定或制度完善的国家开展文化贸易。

二是,发挥语言学习的自身能动性来双向提升语言能力,同时,政府部门可从规划、政策、资金等多个方面给予扶持政策,积极加强人才培养和语言服务。一方面,针对目标市场,学习他国语言、提升语言能力,同时推动汉语的海外推广、提升国外汉语能

力提升,以此来加强特定人群的语言学习和人才培养;另一方面,利用好数字技术,丰富语言教学内容、方式和手段,促进语言和文化创作、生产、传播、交易、消费的全链条转型升级。此外,关注与国家战略与利益相关的非通用语,特别是加强“一带一路”、国际朋友圈的关键战略语种的语言规划及能力建设,强化语言服务出口基地建设。

三是,加强文化自信和对外文化贸易指引,针对经贸协定、文化产品结构、区域市场等差别化制定、推动语言能力建设。一方面,重点加强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语言能力建设,并与各类语言学习、文化交流活动结合起来,通过展览展示、对接洽谈、线上平台等方式推广特色文化产品,拓展核心文化贸易出口。同时,在传统工艺品等非核心文化领域,借助恰当的语言表达、丰富中国文化要素,提升我国文化贸易产品的内涵和品质。另一方面,加强在市场开放度更高国家的语言能力建设,并注重面向发达国家的核心文化贸易的产品创新,“润物细无声”地传播中国优秀文化。此外,进一步开拓一些出口复杂度高的国家、核心文化聚集国的文化贸易,不断优化、升级文化贸易产品和结构,向以价值输出为核心的文化出口强国转变。

四是,以语言学习、能力建设和有效传播为载体,用好数字技术,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充分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华文化符号。加强行业商协会、文化交流平台和经贸活动的协调统筹,共同拓展文化企业出海新渠道、核心文化合作领域和深度,推动“话里”到“化外”的整体超越^[20],持续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五是,围绕语言、文化领域的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应用,加强技术、业务和人员的深度融合,创新叙事方式,完善语言服务实施模式和能力,进一步促进文化贸易出口提质增效。

参考文献:

[1] 张卫国. 论语言的经济效应:理论、经验与启示[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6):120-129.
[2] CHEN M K. The effect of language on economic behavior: evidence from savings rates, health behaviors, and retirement asset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3,103(2): 690-731.
[3] GRIN F. Language planning and economics [J].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2003, 4(1): 1-66.

[4] 董涛. 语言经济知识产权治理结构研究[J]. 中国软科学,2022(9): 16-26.
[5] 张天伟. 国际语言文化推广机构与国家语言能力研究[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3): 149-157.
[6] CHISWICK B R, MILLER P W. Linguistic distance: a quantitative measure of the distance between English and other languages [J].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2005, 26(1): 1-11.
[7] MELITZ J. Language and foreign trade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8, 52(4): 667-699.
[8] MELITZ J, TOUBAL F. Native language, spoken language, translation and trade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4, 93(2): 351-363.
[9] 王立非,崔璨.“一带一路”对外贸易中的语言服务便利度测量实证研究[J]. 语言文字应用, 2020(3): 26-35.
[10] 徐明昊,范梓幸. 双边贸易的语言效应: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证分析[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S1): 157-162.
[11] GOKMEN G.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impact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on trade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7(127): 449-458.
[12] TADESSE B, WHITE R, ZHONGWEN H. Does China's trade defy cultural barriers? [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economics, 2017, 31(3): 398-428.
[13] 顾江,陈鑫,郭新茹,等.“十四五”时期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的逻辑框架与战略路径[J]. 管理世界,2021(3):9-18,2.
[14] 陈波,林馨雨. 中国文化产品出口模式特征:基于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的实证研究[J]. 中国软科学,2019(10):24-38.
[15] 张福贵.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文学文化自信[J]. 中国社会科学,2022(5):143-161, 207-208.
[16] 汪颖. 文化自信与文化产品贸易可持续发展[J]. 当代财经,2023(5): 106-118.
[17] 陈大建,胡杰辉. 综合型语言考试与语言能力标准对接研究:以英语听说考试为例[J]. 外语界,2023(3): 87-96.
[18] SELMIER W T, OH C H. The power of major trade languages in trad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13, 20(3): 486-514.
[19] 李小牧,李嘉珊,刘霞. 我国对外文化贸易的发展变革与成就分析:2012—2021年[J]. 国际贸易问题,2023(6):52-67.
[20] 毛延生,孙晨. 国际传播的文化语用实践:逻辑、路径与自觉[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6): 1-10, 132.

(本文责编:辛 城)